

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韩国学丛书

中韩关系史

(现代卷)

宋成有 姜忻 王蕾 等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韩国学丛书

中 韩 关 系 史

现 代 卷

宋成有 姜忻 王蕾 等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韩关系史: 现代卷/宋成有等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7. 6

ISBN 7-80050-904-4

I. 中… II. 宋… III. 中国-国际关系史-韩国-现代 IV
. D829. 312.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8553 号

中韩关系史

现代卷

宋成有 姜忻 王蕾 等著

责任编辑: 屠敏珠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邮政编码: 100732)

新华书店经销 新世纪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开本 10.5 印张 260 千字

印数: 0001—1500

1997 年 7 月第一版 1997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50-904-4/K·123 定价: 1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绪 言：中韩两国化敌为友的 50 年历史回顾	(1)
第一章 风云变幻	(12)
第一节 光复初期的兴奋与希望	(12)
第二节 大国的介入与半岛南北分裂	(24)
第三节 新中国的外交方针与东北亚两大阵营的 对垒	(36)
第二章 对峙年代	(47)
第一节 血战三年	(47)
第二节 隔海对峙年代的唇枪舌剑	(63)
第三节 50~60 年代中韩对峙的国际因素	(86)
第三章 出现转机	(94)
第一节 70 年代初期国际形势的变化与韩国的 对应	(94)
第二节 半岛形势的新动向：南北对话的开始	(102)
第三节 韩国经济的起飞与中韩政府政策的调整 趋势	(116)
第四章 最初的接触	(132)
第一节 促成中韩接触的环境与条件	(132)
第二节 在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批判中发现共同 语言	(140)
第三节 偶发事件的意外契机：中韩官方代表的 最初良性接触	(154)
第五章 渠道在拓宽	(168)
第一节 中韩经济开发战略的相互选择	(168)

第二节	中韩经贸合作关系的迅速发展·····	(179)
第三节	体育竞技与国民交往的热潮·····	(189)
第四节	编织文化交流纽带的人们·····	(196)
第六章	中韩建交 ·····	(207)
第一节	南北高级会谈与朝鲜、韩国同时加入 联合国·····	(207)
第二节	建交谈判·····	(216)
第三节	中韩建交·····	(223)
第四节	中韩建交意义的一种体现：化解朝鲜 半岛核危机的前前后后·····	(232)
第七章	双边关系的创纪录发展 ·····	(243)
第一节	经贸关系的迅猛发展·····	(243)
第二节	全方位的文化交流与合作·····	(254)
第三节	官民互访的频繁展开·····	(261)
结 语：	21 世纪的东北亚国际格局与中韩关系 ·····	(275)
	现代中韩关系史大事记·····	(288)
	参考书目·····	(325)
	后记·····	(328)

绪 言

——中韩两国化敌为友的 50 年历史回顾

从 1945 年日本战败投降，至 1995 年世界各国以不同方式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50 周年，半个世纪的战后史弹指一挥间，匆匆过去。回顾 50 年的历史，反思这一期间的中韩关系史，若用两句话来概括，可谓世事沧桑，变化剧烈。中韩两国关系从对抗走向缓和，由缓和而建交，经历了化敌为友的嬗变过程。

历史是人物和事件的活动、演变的轨迹纪录。战后中韩关系史、或曰现代中韩关系史也是如此。为纵观现代中韩关系史的轨迹，不妨简略回顾 50 年间重要人物和事件的活动演变历程。

在截止到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近代史上，中韩两国同仇敌忾，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结下深厚的友谊。但共同的敌人一经被打倒，国际反法西斯阵营分裂，美苏对立取代了战时合作；中国的国共两党分道扬镳，势同水火，“双十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挑起内战；朝鲜半岛被美苏两国沿北纬 38 度线分区占领，三千里江山分成南北两半。半岛政治派别丛生，内争不已，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局面，不屈的爱国者金九等不幸遇害，加剧了半岛统一的复杂化。1948 年 8 月以李承晚为总统的大韩民国政府成立，同年 9 月以金日成为首相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原本为美苏分区占领的 38 线竟成为重兵据守的国境线。在中国，1949 年 12 月兵败大陆的蒋介石撤往台湾，同年 10 月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国共两党隔台湾海峡继续对抗。随着“冷战”的升级并按照“冷战”特有的国

际分派逻辑，中韩两国分属东西方敌对阵营，泾渭分明。

1950年6月，朝鲜战争骤发。北方军队兵占汉城，进逼大丘、釜山，韩国危在旦夕。同年9月麦克阿瑟采用拦腰斩断战术，指挥美军在仁川登陆，战局突变。美韩军队大举反攻，迅速占领平壤，战火烧到鸭绿江边。10月，中国出兵抗美援朝，五次战役，鏖战千里，在38线展开了拉锯战。在与美国等16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激战的同时，中韩两国军队间也展开了三年血战。昔日并肩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友邦反目成仇，战争的创痛极为惨烈。

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议》签字，战火平息。但在此后的20余年间，隔海相望的中韩两国严重对峙，依旧不共戴天。围绕维护《朝鲜停战协定》的斗争、东海海事冲突、韩国出兵越南、日本与韩国缔约建交、东海大陆架开发、李承晚及朴正熙等对国内民主人士的镇压等事态，均成为两国彼此口诛笔伐的导火线。70年代初期东北亚形势的变化，给中韩关系带来转机。1972年2月~7月，接连发生下列大事件：尼克松访华、中日复交、半岛南北方开始对话。韩国推行与南方“海洋外交”相呼应的北方“大陆外交”新方针，注意改善对华关系。1979年中韩两国经香港开始了间接贸易。

1978年中国结束了十年浩劫与两年徘徊时期，转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力破两个“凡是”，勾画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蓝图。韩国在朴正熙当政期间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已跻身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集群，成为跃出东海的一条龙。中国治国方针的转换、经济建设热潮的掀起，既急需导入外资和技术，也敞开了国内市场的大门。韩国进入产业转型时期，既有余力向国外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也需要为高新技术产业持续发展，开拓新的市场和活动领域。这种双向潜在的强有力的经济互补性，构成两国化解对立、建立外交关系的巨大可能性。随着世界形势变化，特别是中美接近，以对付苏联咄咄逼人的攻势，东北亚客观上形成了中美日相呼应的战略三角；朝鲜半岛南

北双方互动、自主和平统一的趋势日益明显等新动向，逐渐形成中韩两国言和建交的国际大环境。前述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的步伐加快，大势所趋，前景明朗。

在此情势之下，偶发事件，甚至恶性事件或悲剧性事件，竟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1983年5月，中国民航班机被劫持到韩国，举国震惊。同月，中国民航局局长沈图作为处理这一恶性事件飞往汉城，受到礼仪周正的接待，成为赴韩的首位官方人士。双方签订了处理劫机事件的备忘录。同年8月底，一架偏离航线的大韩航空公司的民航机，在库页岛上空被苏联战斗机击落，机组人员和200余名乘客全部遇难。9月初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发表谈话，对此悲惨事件表示震惊和遗憾，中国舆论也对遇难者给予充满善意和同情的报导。劫机和空难事件的肇事者应当受到追究和谴责，然而，在中韩两国尚无正常外交关系的非常情况下，却从两事件的处理过程中，隐约透露出两国关系走向解冻的最初信息。此外，在批判日本军国主义、抨击日本文部省篡改历史教科书的过程中，两国人士发现了许多共同语言，两国政府的外交行动也在不谋而合地相互呼应。

久寒乍暖，离真正的春回大地、冰雪消融，尚有较长的时日要等待。1984年8月韩方提前释放劫机犯并允许其前往台湾的作法，引起中方的强烈不满和严正抗议。见诸中国报端的韩国消息，依旧是学生的反政府斗争、大规模的工人运动或抨击内阁改组等等。在韩国的教科书中，中国仍被划入“敌对国家”行列。

然而，打破两国冰冻隔绝状态，实现中韩关系正常化的春潮已在涌动。1985年勤于海外开拓的韩国企业家迈出勇敢的一步，开始对华直接投资。尽管当时投资额不大，项目水平一般，但毕竟是第一批报春的飞燕。1987年中韩关系进一步解冻，外交官在国际场合进行过最初的接触，并被国际舆论渲染为两国外长级的会谈。1986年和1988年在汉城举办的第10届亚运会和第24届奥运会以及1990年在北京举办的第11届亚运会，为两国国民的

直接接触提供了难得而适时的机会与场所。在金浦机场，在汉城，中国运动员受到热情的接待，亲身感受到韩国普通国民对中国的友好感情。中国运动代表团在奥运比赛中虽遭挫折而被报刊称为“兵败汉城”，却在民间外交中，获得丰硕成果。在北京，在工人体育场的亚运会开幕式上，列队入场的韩国运动员也为观众的热情所感染，不断把彩扇抛向看台，前来助威的韩国观光客与中国观众同坐在看台上，欢呼、鼓掌……，在两国国民的心中，造成两国隔断对峙的坚冰已经溶化，乘亚运会的吉庆，1990年10月中韩双方签订互设商业代表处的协议。

两国民间的最初学术交流，为恢复中韩传统友好交往，推动早日实现邦交正常化，鼓起巨大波澜。1988年11月，抗日老战士、著名韩国学者金俊烨博士访华，旧地重游。1989年4月，辽宁大学校长冯玉忠教授率队访韩。1991年6月，应韩国社会科学院金俊烨理事长的盛情邀请，中国学术界泰斗季羨林先生与北京大学韩国学中心主任杨通方教授、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李滔等一行访问韩国，会见了学术界、文化界等音讯中断多年的老朋友及各方面人士。握手言欢之间，宾主同发“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感慨，也相约为中韩建交、加深友谊而尽心尽力。中韩两国的学术交流先于邦交正常化而逐渐铺开，并迅速编织成联结两国友好交往的坚韧纽带。

有赖于两国官民、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中韩关系以尽快实现邦交正常化为中心，快速而顺利地大步前进。继1991年4月中国国际商会驻汉城代表处挂牌办公，5月在汉城举办的中国国际商会贸易展览会圆满结束。会展期间，韩国国民对第一次亲眼目睹的中国贸易商品兴奋不已，纷纷对中方人员表示祝贺，表现出期盼两国早日建交的极大热情，展览会收获颇丰。同年9月，韩国与朝鲜同时加入联合国，中韩建交的时机日臻成熟。

1992年元旦，在这万物更新之时，中韩两国《民间贸易协定》在北京签字，绽放出新年伊始的第一枝报春花。同年5月，当

北京春风扑面、百花盛开时节，两国进而签订了《中韩投资保护协定》，为两国发展和继续扩大双方的经济关系加上了安全阀与驱动器。同月，韩国商品展览会首次在北京举办，赴会参观者十分踊跃；在汉城，中国贸易展览会隆重开幕，同样吸引着各界人士。强劲的经贸纽带在变宽加厚，迅速拉近了两国邦交正常化的距离。4月至7月，秘密的外交会谈在汉城和北京轮流举行，以妥当方式处理了台湾问题，搬掉中韩建交的最后—道障碍。至此，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已是冰雪消融、水到渠成。

1992年8月23日，韩国外务部长李相玉等一行身负中韩建交的历史使命，来华访问。在北京机场，受到中国外交部官员的热烈欢迎。24日两国外长在北京举行会谈，顺利达成一致并正式签署中韩建交的联合公报，向全世界郑重宣布：自即日起，两国相互承认，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8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祝贺中韩两国建交》。韩国《中央经济新闻》则在8月22日发表文章《韩中关系新篇章》；高度评价两国建交的深远历史意义。建交翌日，杨尚昆主席、李鹏总理分别会见李外长，亲切交谈；建交当日韩国总统卢泰愚发表特别声明，盛赞韩中建交有利于东北亚的安全与繁荣。北京和汉城一派喜庆气氛，国际舆论也同声道贺。宛如启动闸门、听凭—江春水喧嚣奔腾，在此后一个多月里，从8月26日汉城艺术团访华、27日两国使馆升旗，到9月27日卢泰愚访华，见诸报端的各种重要交往近20次，其频繁程度确属罕见。

自建交至今，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中韩关系发展的速度、广度、深度均呈现令人振奋的趋势。由于两国之间不存在导致关系紧张的敏感问题，政治关系良好；也由于在构筑21世纪东北亚国际新秩序、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局面、批判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等方面，两国有许多共同语言，因此，在政治上，两国树立了意识形态有异、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友好相处、平等协商的典范。在建交后短短的几年内，金泳三总统、江泽民主席实现了两国首

脑级的互访，政府总理、国会议长等高级领导人物的互访也顺利进行并取得许多成果。无论是在北京、汉城，还是在西雅图、茂物、大阪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非正式首脑会议或最近在曼谷举行的亚欧会议上，中韩两国的领导人总是在以诚相见、气氛融洽的会谈中取得共识，并一再重申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不断推出良好交往的政治关系的新局面。

在经济方面，经贸关系的发展势头强劲，呈现跳跃般的高速度。1995年双方贸易额达到165亿美元，是建交前1991年58亿美元的2.8倍，1995年韩国对华投资为73.3亿美元，是1991年1.6亿美元的45.8倍，中国成为韩国最大的投资对象国；大宇、三星、现代、乐喜金星、鲜京等著名大企业成为投资的主体，投资领域涉及家电、汽车、石化、钢铁、纺织、农业、金融等不同部门，项目的高科技含量显著增加；与此相应，中国的石油化工、煤炭、五金矿产、纺织等行业的进出口公司也加强了与韩国同行的合作。

在文化领域，两国的交流普遍展开。在韩国，学汉语“热”持续升温，大批学子负笈西渡，来中国留学，总人数由1993年的500人迅速增加到1995年的5000人；韩国国际交流财团、大宇等有眼光的企业对促进两国文化学术交流事业大力协助；国立汉城、釜山、庆北、全北等大学以及私立高丽、延世、成均馆、汉阳、梨花、淑明、东亚大学等各种类型、分布各地的大学纷纷与中国的大学建立交流关系，举办国际会议、开展共同研究和互换图书资料、互派访问学者等多种学术交流全面展开。在中国，韩国学“热”骤然升温：各种韩国研究机构迅速增加，从白山黑水到浦江珠海，数十个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研究刊物成倍增加，1993年10余种韩国学刊物争奇斗艳，一改韩国学刊物寥若晨星的冷清局面；报刊杂志中，有关韩国的报导、文章也大量增加，以满足中国读者急欲了解韩国的需要。出现在中韩两国的两种文化“热”，敏锐地反映出两国关系良好发展的现状，也预示了

其广阔的发展前景。

回顾中韩两国建交前相互关系的曲折历程和建交后迅猛发展的业绩,展望今后乃至 21 世纪的趋势,有必要从总体上把握现代中韩关系进程中的下述特点,以总结过去并昭示未来:

(1) 作为本身是双边关系的中韩关系,历来离不开国际因素的制约。换言之,两国关系的分与合、亲与疏,不仅仅取决于两国的抉择,而且深受世界形势、东北亚国际关系的强烈影响。就这个意义而言,中韩关系是世界中的双边关系。无须忌讳,三年朝鲜战争曾给中韩关系造成惨重的历史创伤。但客观地说,两国兵戎相见的直接责任并不在中韩两国,因为两国的任何一方并未向对方主动挑战或率先发动攻击。然而,中韩之间毕竟血战三年。究其因,主要是当时分属东西方两大阵营的中韩两国,在导源于欧洲的“冷战”演化为东北亚的热战时,当两大阵营的对峙白热化并相互猛烈撞击时,中韩两国间虽战非所愿,也无法避免相互间的交战,用血写下了现代中韩关系史中最沉重的一页。

《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是东西方阵营边对话、边对峙的结果。中韩两国关系受此大框架的制约,虽熄兵革,却难化玉帛。彼此枕戈达旦,展开口诛笔伐。直到 60 年代中苏论战、发生边境冲突,社会主义阵营分裂,以及 70 年代初期中美接近、中日复交、半岛南北对话,中韩关系方出现解冻的征兆,出现互动的转机。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中期,出现中美日战略三角对抗四面出击的苏联扩张势头的格局,中韩关系随之进一步转暖。90 年代初期苏联解体,美苏两极体制崩溃,世界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多极化时代,中韩关系终于突破无邦交的不正常状态,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展望 21 世纪的中韩关系,至少在一定时期内,依然要受到日美韩、中日韩、中日美、中俄朝等战略三角以及中美、中日、中俄、中朝、韩美、韩日、韩俄、韩朝等一系列双边关系的制约和影响,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中韩关系同样要对上述多组战略三角或双边关系,产生强有力的影响。特别是政治大国的中国

成为经济大国，以及朝鲜半岛南北统一实现后，中韩两国关系的走向，必将对东北亚、东亚和世界局势产生更强烈的影响。不难想见，届时在中韩关系之中，世界中的中韩关系和中韩关系中的世界等特色，将进一步显现出来。

(2) 经贸联系是中韩关系持久发展的基石。在打破两国关系坚冰的漫长过程中，经贸联系发挥了开路先锋的积极作用。经贸联系之所以先于邦交正常化而迅速建立并稳定发展，首先得益于7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环境提供的“天时”，即缓和之风遍吹，和平与发展日益成为时代的主旋律；经济因素逐步取代军事因素，决定着各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兴衰沉浮；各国竞相把发展经济放在国家战略的首位，注重经济利益而淡化意识形态的歧见。其次，也得益于中韩两国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所提供的“地利”。在全球经贸活动中，海洋运输是最主要的手段。中韩两国隔海相望，黄海、渤海和东海等三大海域联结着大陆和半岛。中国的大连港、秦皇岛港、天津新港、烟台港、威海港、青岛、连云港、上海港与北仑港等沿海大港，与韩国的仁川、群山、木浦、丽水、釜山、蔚山等天然良港遥遥相对，近在咫尺，形成两国经贸联系的庞大的网络。在不久的将来，东起连云港，途经亚欧7国，西抵荷兰鹿特丹港，衔接西太平洋和大西洋、全长1万余公里的亚欧大陆桥一旦贯通，将为中韩经贸活动深入亚洲腹地并直达欧洲枢纽地带，提供前景喜人的大动脉，并将进一步密切中韩海陆空立体经贸网络。第三，经济发展前景一派活力。自70年代以来，韩国经济增长名列东北亚诸国前茅；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突飞猛进。中韩两国迅速进入世界主要贸易大国的行列，通过互补，彼此吸引、促进，结成日益密切的伙伴关系。递次展开、高潮迭起的中国改革开放浪潮，为中国经济急剧增长和中韩经贸联系的加强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1980年，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等4个经济特区的设立，掀起以华南为先导的改革开放初潮；1984年，大连、天津、青岛、上海、温州、广州、等14个沿海港

城全部对外开放，为华南的初潮推波助澜；1985年又将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列为沿海开放区，再鼓新潮。在上述背景下，韩国汉斯物产等企业开始对华直接投资，经贸日趋活跃。1988年海南设省并被划定为最大的经济特区，辽宁、山东、广西若干县市列入对外开放地区，布局规模越来越大，形成改革开放的又一大潮。大字、三星、金星等大企业在这期间，成为来华投资的弄潮儿。至90年代初，以上海浦东开发区的迅速创设、京津齐头并进为驱动力，环渤海、环黄海、环东海经济圈与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黄金水道构成巨大的T字形经济开发网络，为韩国企业扩大事业提供了自沿海向内地辐射的良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韩经贸、投资的规模连上新台阶。展望21世纪，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广阔前景，将在加深加宽中韩经贸联系的同时，密切两国关系。其意义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而且对建立东北亚国际新秩序，维护东亚乃至世界的和平，推动和平、发展与合作的世界潮流滚滚向前，也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3) 传统文化、传统友谊和传统价值观是稳固与发展中韩关系的坚韧纽带。与日本、越南等周边国家相比，中国与韩国的传统文化联系更久远，也更紧密。两国不仅同属一般意义上的东亚文化圈，而且拥有儒学、佛教、道教等同源的深厚传统文化。在两国现代化的进程中，传统文化发挥着大体相近的巨大作用：强调仁义礼智信五常与忠孝观念五伦道德的儒学，主张自我修炼、利他主义的东亚化佛教，倡导协调人与大自然相互关系、崇尚自然之道的道教等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被提炼出来，用以激发稳定社会秩序的自律意识、克己奉公的群体观念，并为解决现代化过程中的各种社会病、环境问题、资源分配问题，指点着迷津。同样，传统的诗词歌赋、水墨山水，也能在两国各界人士的交往中，引起心灵的共鸣，油然而生宾至如归的亲切感，沟通了精神世界。

中韩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可谓源远流长。三四千年间，虽也有短时期的不愉快，但从总体上看，友好交往为中韩关系史的

主流，曾留下许多感人至深的友好佳话。特别是明代以来，两国军民共同抗击外敌入侵，形成唇亡齿寒、休戚与共的密切关系。中韩两国的传统友谊是值得珍惜、弘扬的宝贵历史遗产，应当在今后的关系发展中再现辉煌。从价值观上看，儒家的纲常伦理与经世济民观念，奠定了传统价值观的基础。至近代，中韩两文明古国在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形成过程中，因落伍于时代而惨遭丧权辱国甚至亡国的历史不幸，同为天涯沦落人的遭遇，促使两国的仁人志士立下共同的民族宏愿：洗刷百年之耻，以光复旧物、自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并由此形成中韩人士以维护国家主权、实现民族独立与腾飞为核心的价值观。勿庸赘言，这种价值观在两国发展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以国家民族观念为核心的价值观，本身具有超意识形态的特性。因此，尽管中韩两国社会制度不同，两国人士却不难从传统的或现代的价值观中，找到共同语言，彼此尊重，携手合作。当然，由于冷战对峙造成两国的长期隔绝，以及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差异，也导致价值观相异的一面。因此，也有必要弄清两国价值观中的异同，减少摩擦，避免冲突，使健康的价值观发挥促进两国交往的积极作用。

从官民角度出发，中韩关系可分为官方与民间两大类。无论何种层次交往中的个人，总要或多或少地受到各自民族性格的影响。因此，在把握中韩关系进程时，也有必要谈及深层的精神因素，即两国人士的民族性格问题。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韩两国形成了既同又异的民族性格。由于韩国为单一民族国家，中国则是多民族国家，即使同为汉族，也有北方人与南方人、沿海人与内陆人的地域差别，情况较韩国更复杂些。因此，谈到了民族性格的异同，不妨以深层精神因素的历史积淀为基础，排除个案的例外，作整体意义上的比较。就相同之处而言，勤劳、勇敢、崇尚忠孝、气节、礼仪等，为中韩两民族所共有。作为同中之异，则相对前者的韧，后者更突出表

现为刚；相对前者的大陆气质，后者更多一些半岛人气质；相对前者较多的个人色彩，后者的集群意识更强烈一些；相对前者的沉稳，后者较为性急；相对前者的旷达，后者自尊意识极强，等等。中韩之间的官民交往，总要通过不同性格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实现，了解对方的气质秉性、性格特征，是搞好人际交往的重要前提。在一定场合下，其意义并不亚于对对方政治理念、资信状况、学识专长的了解。在两国日益频繁的往来中，理解对方的民族性格，互敬互让，扬长避短，是促进友好合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综上所述，在世界中的中韩关系和中韩关系中的世界等相关联系中，纵观战后中韩关系的发展历程，从中引出必要的经验教训；把握这一期间中韩关系的基本特点，以因势利导，开创两国关系的新局面，是本卷撰写者们总立意的所在，以及力图贯穿本书写作过程的两个基本出发点。能否贯彻始终，当由读者评说。

第一章

风云变幻

第一节 光复初期的兴奋与希望

1945年8月9日上午10时30分，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在广岛被原子弹轰炸、苏联宣布出兵东北的紧急时刻举行。在是否迅速停战并接受《波茨坦公告》的问题上，首相铃木、海相米内、外相东乡与陆相阿南、参谋总长梅津、军令部长丰田展开了激烈争吵。就在双方意见严重对立、僵持不下的关头，美国飞机又在长崎扔下了第二颗原子弹。下午3时，会议继续举行，直争吵到夜里10时，仍无法取得一致意见。临近当日午夜，一身戎装的裕仁天皇出场，召集御前会议。在听取了诸大臣意见后，裕仁在10日凌晨2时作出“圣断”，支持外相东乡的意见，即在保全皇室、维护国体的前提下，接受《波茨坦公告》，停战投降。同日清晨7时许，外务省通过中立国瑞士和瑞典，将御前会议的决定转告同盟国。

无线电波把日本战败投降的消息传遍全世界，刹那间，掀起了同盟国军民欢庆胜利的狂潮。特别是在抵抗日本军国主义大规模侵略历时最早、牺牲最惨烈的中国各地，抗战军民、盟国官兵和韩国志士们，以各种方式表达着对期盼已久的胜利的兴奋与欣喜。

在陪都重庆，人们奔走相告，欢声雷动。在西安，来访的韩国临时政府主席金九看到大街上“到处是人山人海，高呼万岁的